

平庸之恶：大语言模型时代 “互文性”知识生产的悖论

揭其涛

【内容摘要】 大语言模型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介入知识生产，其影响不止于效率的提升，更在于重构知识被理解、判断与继承的方式。以“互文性”为核心特征的生成机制，使文本在既有话语之间能够频繁流转重组，呈现出高度流畅、逻辑自洽且广泛可接受的知识形态。但在这种看似“合理”的生成过程中，差异、否定与判断正被悄然消解，复杂问题被提前收敛为安全稳定的答案，知识生产由此显现出一种隐蔽且结构性的“平庸之恶”倾向。这种平庸并非错误或低质知识，而是强调互文性的自动化、规模化与去主体性，导致判断责任的转移与主体位置的退场。由此，知识生产越来越依赖算法对既有语料的概率拟合，不再通过争论、质疑与反思展开，只能沿着技术互文性的既定路径被不断确认与强化。若长此以往，知识生产中独有的灵韵、人性、情感、体验将逐渐被湮灭。就此而言，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真正挑战，是避免知识在持续生成中丧失张力与深度。只有在技术设计中为不确定性和多重理解保留空间，在制度安排中防止效率逻辑对创新路径形成低阶锁定，并在文化层面重新强调判断、责任与内在体悟的价值，知识生产才可能摆脱平庸化的引力，重新通向新问题、新意义与新可能。

【关键词】 互文性 知识生产 知识灵韵 生成式人工智能 平庸之恶

【作者】 揭其涛，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24）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的知识生产备受关注。作为主体身份的大语言模型能够以超高效率整理和分析海量数据，回应用户需求并进行个性化的知识生产。在以往的认知中，知识生产的主体必然是人，这体现了人类作为认知主体的独特性与创造力。正是因为对知识的探索、积累、反思，人类才有当前璀璨的文明和伟大的创造力。但在“人一机”协同的知识生产中，人工智能逐步走向前台，而人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



① 刘海龙：《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编辑之友》2024年第3期。

② Ulrike Cress and Joachim Kimmerle, "Co-constructing Knowledge with Generative AI Tools: Reflections from a CSC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vol. 18, no. 4, 2023, pp. 607-614.

③ 姜华：《何种媒介，哪类知识：试析作为知识媒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现代出版》2024年第9期。

④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社，<https://www.xinhuanet.com/20251028/337438370029449296539148a206bdd1/c.html>，2025年10月28日。

⑤ 刘智锋、吴亚平、王继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对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影响》，《情报杂志》2023年第7期。

⑥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号分析探索集》，史忠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却似乎在慢慢隐遁。尽管有研究指出，“人工智能目前提供的知识性质非常暧昧，介于权威的正式知识与日常缺乏根据的非正式知识之间”^①，即使能够对“知识建构”^②产生一定的作用，主流学界仍多认为其是一种“无意识一用”之知识。^③但是这种判断背后的依据仍是孱弱的，为什么人工智能生产的知识是无意识的、值得警惕的、需要反思的？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回答。“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④。在人机深度融合逐步成为知识生产的新趋势下，^⑤厘清人类知识生产与人工智能知识生产的本质差异，构成理解这一问题的认识论前提。

基于此，本文从知识生产的本体论出发进行反思，回答知识生产中“人之所以是人”这一宏大且复杂的议题，以期厘清人类知识生产的内在必然特质或结构；进而，回应更为根本的问题：当知识生产日益呈现出高度互文化、自动化和去主体化特征时，如何避免技术路径对认知结构、公共理性与创新能力形成低阶锁定？本文将大语言模型的知识生产置于认知科学、知识论等多维视域中，旨在反思人工智能知识生产中“平庸化”的问题，在更为广阔和深刻的视阈中理解与观察其背后所连接的对于知识生产与人类生活世界之间关系的深切关怀。

互文性知识生产：基于知识本体论的考察

大语言模型（LLM）的知识生产，其最根本的技术特征在于构建了一种“互文性”知识生产模式。互文性伴随着人类漫长的知识生产历程。柏拉图曾提出“模仿说”，在他看来，诗歌总是参考先前创造的文本，而这个所谓创造的文本也是对其他文本的复制。也就是说，一个文本不是自己生成的，在它生成的过程中必然掺杂着对其他社会知识的参考。索绪尔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将语言符号分成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两者在符号整体中彼此呼应而又相互对立。索绪尔认为任何一个语言单位、语言成分，只有放到“语言棋盘”当中，同其他语言单位、语言成分联系起来才具有语言价值。而正式提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学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她看来，语词（或文本）是众多词语（和文本）的交汇，人们至少可以从中读出另一个语词（文本）来。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变。^⑥

本文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共享一个基本判断，即知识与文本并非自主生产，而是在与既有话语结构的持续对话中形成的，意义也是在差异性话语的碰撞中生产的。本文侧重讨论的是一种历史条件已经改变后的“技术互文性”，其特质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互文性中“转化”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以“转化”为核心，强调话语在进入新语境时发生意义偏移。而在大语言模型语境中，互文性更多表现为统计意义上的重组与拟合，转化则被压缩为形式层面的替换，深层意义偏移反而被最小化。因此，互文性从“生成差异的机制”转变为“消解差异的技术”。二是主体在互文性中的位置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传统互文性理论中尽管主体被“去中心化”，仍通过话语实践参与意义生产。但是技术互文性将主体进一步边缘化为“使用者”或“调用者”，判断、选择与责任被嵌入系统流程，从而发生“去主体化的再升级”，最终转向“主体被悬置”。三是互文性的时间结构被重写，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嵌入历史时间，强调话语之间的历史张力。大语言模型的互文性以既有语料的高频分布为基础，倾向于固化过去，由此导致差异被压缩、否定性被弱化，意义生产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的倾向。正是在这些历史条件的转变中，

互文性在克里斯蒂娃的意义上激发了创新与开放性的文化机制，转化为一种需要被重思的技术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语言模型的知识生产也是从社会、文化等因素构成的“大文本”中派生的，它们之间有共同母体（matrix），彼此相互参照，以新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世界。学者们也关注到了这一点，认为“ChatGPT就是这样一种编织和援引，它是互文性理论的最终实现”，^①提出要“重新审视互文性概念的生产力，以及人工智能对文学写作和作者观念的冲击”，^②强调“超文本与交互性的知识生产新形态的数字出版，开启了人类社会知识生产、传播的新模式”。^③有的学者还关注到“人工智能影像符号的互象叙事”^④“Sora 影像生产中的符号互文”。^⑤以上研究都关注到互文性所具备的内在张力，促使主体在吸收既有文本的同时，对其进行重组、反思与超越。但是目前尚未有研究明确指出，大语言模型语境中的“互文性”所发生的根本性结构变异，它的主体消隐是一种以统计相关性、概率预测与语料覆盖率为核心的技术互文性。在这种模式中，互文性的机制固化且价值被遮蔽，文本之间的关联不再由问题意识、价值判断或创新冲动所牵引，而是由算法对既有语料分布的最优拟合所决定。

本文所讨论的“互文性”是一种被高度技术化、自动化并去主体化的互文性结构。也即，在庞大语料与算法机制支持下，知识以拼贴、援引、编织为基本操作，经由“去中心化”的网络连接被持续再语境化的过程。这种互文性一方面在形式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与密度，使知识生产呈现出高度连贯、逻辑自洽与即时响应的特征；另一方面，在深层结构上不断削弱知识生产中最为关键的断裂性、否定性与超越性。由此形成的悖论在于，互文性在技术层面被无限放大，却在意义与价值层面被持续压缩。文本之间的关联越是紧密，知识生产越容易滑向一种“看似丰富、实则同质”的状态。引用、重组与再表达越是高效，真正的问题意识、创造性偏离与价值判断反而越难以出现。正是在这一结构性悖论中，互文性不再天然通向创新，而开始成为“平庸之恶”得以扩散的重要技术条件。当然，要深刻理解这一模式带来的变革，必须回归知识论的根基，从知识本体论（Ontology of Knowledge）的视角对其进行考察。

知识本体论关注知识的本质、结构及其分类原则，其核心问题包括知识是什么？知识如何存在？知识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什么？以及知识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如何确立？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哲学的认识论（Epistemology），也涉及本体论（Ontology），并直接关联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在数字时代，随着数据量的爆炸性增长、人工智能的发展、算法的复杂化以及网络社会的形成，传统的知识本体论需要被重新审视和调整。

一方面，互文性生产动摇了知识的本质属性。知识是一个复杂概念，^⑥一般意义上，知识被定义为“被证实的真实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即知识不仅仅是信念，还需要满足真实性和合理性的条件。除此之外，诸如可靠主义（Reliabilism）、德性认识论（Virtue Epistemology）等观念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知识的本质，强调知识的生成过程、认知主体的能力以及知识的社会维度。但 LLM 互文性生成的内容并不一定基于对世界的真实理解，而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统计学习和模式匹配生成文本。这种生成方式使得知识的“真实性”变得模糊，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非真实”的知识仅仅建立在当前人们的认知之中，不能武断地认为大语言模型互文性生成的知识就是非真实的、不可靠的，这种知识生产中的灵光一现可能就有过“人”之处。大语言模型模糊了知识“真实性”和“合理性”的条件，因此，知识是否可以被视为纯粹的工具性输出也充满了疑问。

① 汪民安：《ChatGPT的互文性、生成和异化》，《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② 钱翰：《在人工智能时代重审对话性与互文性概念》，《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1期。

③ 孙玮、李梦颖：《数字出版：超文本与交互性的知识生产新形态》，《现代出版》2021年第3期。

④ 张伟：《“互象”叙事与数字时代图像文本的意义生产——兼及考察人工智能影像生成的一种视角》，《社会科学》2025年第10期。

⑤ 张伟：《符号互文、数据重组与拟像再现——Sora 影像叙事的修辞学建构及其审美逻辑》，《云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⑥ 罗素：《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7页。

另一方面，互文性生产冲击了知识的存在方式。知识是一种独立于认知主体的客观存在，还是依赖于主体的主观建构？这一问题在哲学史上形成了两种主要立场——实在论（Re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实在论认为，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其存在不依赖于认知主体。比如波普尔认为，“客观意义上的知识是没有认识者的知识：它是没有认识主体的知识”。^①而建构主义则认为，知识是认知主体在与世界互动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其存在依赖于主体的认知活动和社会文化背景。但就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而言，人们在普遍意义上都认为知识是人类认知主体在与世界互动过程中生成的，其存在依赖于主体的认知活动。斯宾诺莎认为，身体总是受外物的刺激而运动，因此“人的身体为外物所激动的任何一个情形的观念必定包含有人身的性质，同时必定包含有外界物体的性质”。^②而在互文性生产模式下，知识的生成是动态、即时且依赖于算法和数据流的。这种动态性使得知识不再是静态的、独立于技术工具的存在，并非仅依赖于主体建构，而是变成了依赖于算法和数据流的动态过程。

此外，互文性生产改变了知识的构成要素。知识通常被认为由主体（认知者）、客体（被认知的对象）和认知过程三个要素构成。在数字技术的背景下，知识的构成要素发生了变化。LLM的“人一机”对话模式完全打破了知识获取的自主性。^③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使得知识的生成不再完全依赖于人类的直接参与，而是通过算法自动完成。这使得知识的构成要素从传统的“主体—客体”二元关系扩展到“主体—技术—客体”的三元关系，知识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学术界、科学界等权威机构。并且，大语言模型的知识生产依赖于数据而非理解，这使得知识的生产机制从传统的认知过程转变为数据驱动统计过程，从而缺乏意图性和目的性，本质上只是基于输入提示的随机性响应。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知识的生产机制，也对知识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提出了新的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互文性生产动摇了知识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知识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知识的增长是否意味着人对世界的理解越来越接近真理？这些问题在科学哲学中尤为重要。比如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认为，科学理论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描述；而反实在论（Anti-Realism）则认为，科学理论只是对现象的工具性解释，“科学知识不是绝对的，而是视角性的”，^④并不一定反映世界的本质。当前，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知识的生产验证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技术工具和算法，这使知识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间接和复杂。当科学观察依赖于传感器、模拟软件或大型语言模型等中介技术时，所谓“原始数据”本身已经是经过多重符号化与解释框架过滤的产物。知识不再是直接“反映”现实，而是在不同话语体系、技术平台与理论预设之间不断协商、转译和重构的结果。

互文性的技术机理：拼贴、援引与相互编织

在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中，互文性知识生产通过其特有的算法机制实现了对信息的广泛拼贴、援引和相互编织。这些技术表征不仅改变了知识创造的方式，也深刻影响了知识的内容和形式。知识的“所有的作品、所有的文本、所有的表意成果其实都是互文性的编织”。^⑤知识本身的创造性由此遗失，知识生产的技术表征用诗人艾略特的话来说，成了“小诗人借，大诗人偷”。^⑥

拼贴（bricolage）强调数据文本从碎片到新整体的构建，指从大量分散的数据源中抽取片段，并将它们重新组合成新整体的过程。这依赖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能力，特别是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进步，使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并关联不同来源的信息。通过文本挖掘和语义分

① 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126页。

②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2页。

③ 焦艳鹏、刘威：《知识获取、人工智能与图书馆精神》，《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年第5期。

④ R. N. Giere, *Science without Law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150.

⑤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号分析探索集》，史忠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译者序”第7页。

⑥ T. S. Eliot, *The Sacred Wood: 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1, p.114.

析，算法可以从海量文献中提取出相关的句子或段落，再根据特定的主题或逻辑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形成知识文本的互文叠加（intertextual overload）。大语言模型互文性知识生产中的援引，强调既有知识的“智能引用与发展”，在既有知识的基础上借助强大的搜索能力和上下文理解能力，能够智能地查找并引用相关文献或数据，确保新内容的产生。这种文本拼贴利用预训练的大型语料库来识别、输入与问题最匹配的知识片段，并结合上下文生成连贯且合理的回答。其最大的特点在于能够根据用户的反馈优化自身的引用策略，从而不断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相互编织则是指知识元素之间复杂的交织关系，超越了简单的引用和拼接，形成了由众多节点构成的知识网络，并且其中隐匿着利益、权力与控制因素。在这个网络中，每个节点都永不终止地（infinite）与其他多个节点相连，进而产生丰富的语义联系。相互编织使得知识生产中的某个概念可能会被多次提及并在不同位置以不同方式解释，形成多层次的语义结构。互文性知识生产中的相互编织反映了知识生产的社会性和互动性特征，表明知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动态变化的关系体系之中。在这个空间里各种各样的著述相互混合、相互冲突，却无一不是本源。文本只是从不计其数的文化中抽取的一套引文。^①随着更多的个体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知识网络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推动了集体智慧的增长和发展，产生了相应的语义联系，知识生产也最终形成文本的海洋，并无限伸展和蔓延。遗憾的是，这种知识生产中的文本编织无法纳入知识生产中的肉身和灵魂，以及知识生产中的快感和痛苦，排除了身体性的体验与情感性的感悟，成为一种纯粹的文本操作。

综上所述，通过对知识本体论及互文性技术机理的考察可以发现，极致的互文性生产模式一方面带来了效率，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两大核心问题：一是“悖论”，它与人类知识生产中不可或缺的情感与灵韵产生了冲突；二是“危机”，它可能催生“平庸化”知识泛滥的状态。这也是下文将要深入探讨的核心议题。

互文性的悖论：普遍化、遮蔽性与情感灵韵的退潮

大语言模型对知识的编织、交织、混合，形成了自身“互文性”的特质。互文性带来规模化增益的同时，也通过模板化重组削弱了情感卷入与主体意向性，这正是“灵韵”减损的机制性来源，而非单纯的审美遗失。

（一）普遍化的技术增益与遮蔽性风险

互文性促进了知识生产的普遍化。每一篇新作品都可以被视为对已有文本的延续或扩展，这种现象不仅体现为数量层面的增长，如每天都有海量的新文本被创作出来。更重要的是，在质量层面，通过不断引用和重构现有资源，新的见解得以浮现，知识边界得以拓展。拼贴、援引与编织使得不同领域、不同语境的知识得以跨界重组，形成一种去中心化、快速扩散的知识网络。这种普遍化显著降低了知识生产的门槛，使非专业主体也可以调取、组合并输出多领域的内容，从而带来规模化的知识可达性和跨领域的创新潜力。

然而，互文性同样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遮蔽性问题。算法重组往往以统计相似度和高频共现为优先准则，从而倾向于保留“稳态”的、在训练语料中占比高的表述，而对少见、非典型或语境特异的表达加以弱化。这导致差异性被压平、语境被稀释，独特的文化与思想背景被掩盖在表面

① 罗兰·巴尔特：
《作者之死》，拉
曼·塞尔登：《文
学批评理论：从
柏拉图到现在》，
刘象愚等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0年，
第321页。



多样化、实则趋同化的输出模式中。普遍化与遮蔽性形成了内在张力，前者扩展了知识的传播半径，后者则收窄了知识的多样深度。由于过度依赖先前材料，一些重要的观点或创新可能会被忽视或淹没在庞大的信息洪流之中。特别是在大语言模型根据预训练的数据生成内容时，可能无意间复制甚至强化了部分偏见或错误信息。因为训练数据的选择和处理方式不可避免地包含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技术局限，进而会影响模型输出的质量和公正性。

（二）情感卷入的稀释与主体想象力的弱化

在传统知识生产中，情感远不止是修辞层面的装饰，而是主体深度介入与意义生产的核心动力。创作者在书写、研究或创作过程中所投入的情感，无论是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悲悯、对自然现象的惊叹，还是对社会不公的愤怒，都与其所处的具体时间、空间和社会语境紧密交织，赋予知识以独特的氛围、温度与价值取向。“包括信任、信心、信念或信仰在内的主体情感，在人类知识建构活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①虽然情感流动于知识生产中是微小的、纤细的、不易察觉的甚至是不可见的，但这种情感的确是内嵌于认知过程本身的构成性要素。正是这些或显或隐、或强烈或微弱的情感流动，构成知识的“灵韵”（aura），使其在代际传递中能够激发共鸣、唤起共情，成为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黏合剂。如司马迁对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描写，不仅基于史料，更渗透着他对英雄末路的深切惋惜。达尔文在《物种起源》手稿中反复修改的字迹背后，隐藏着他对理论知识可能引发宗教争议的焦虑与犹豫。这些情感细节虽然未必直接呈现于最终文本，却深刻影响着知识的形态与走向。然而，在大语言模型驱动的当代互文性知识生产中，这种主体性的情感维度正经历系统性衰减。当互文性被算法规模化运作时，知识的生成逻辑从“沉浸式创造”转向“代理式调用”。用户不再是置身于特定语境中的思考者，而更多扮演提示词（prompt）的输入者或结果的筛选者。模型本身则以语义连贯性、逻辑一致性与输出稳定性为优先目标，倾向于规避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表达，而这恰恰是情感最活跃的地带。

更关键的是，为了适配广泛受众并避免争议，大语言模型在拼接、重组已有文本时，会自动“中性化”情感色彩。如要求模型撰写一篇关于战争的反思文章，它可能综合大量新闻报道、学术论文与文学作品，但最终输出的往往是一种平滑、克制、缺乏个体痛感的“共识性叙述”，既无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沉郁，也无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笔下拓荒者面对荒原时那种混合着希望与绝望的复杂情绪。情感在此过程中被稀释、标准化，甚至被剔除，以换取所谓的“客观性”与“普适性”。其结果是，知识产出在情感维度上呈现出明显的“低温化”趋势。主体意向性被遮蔽，个人立场被模糊，独特的声音被平均化。尽管模型能高效整合海量信息，却难以复现那种由真实生命经验所激荡出的情感张力与创造性火花。而正是这种火花，曾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点燃了思想的突破、艺术的革新与伦理的觉醒。

因为从根本上而言，知识生产并非仅是对外部世界的被动反映，而是个体在与世界互动中的主动建构，深深植根于个体的感知、情感、想象和反思中。“艺术家们向内观照自己心中的激情与感受，向外靠心理能量去神遇事物的印象和感觉，与对象的生命之流撞击交融产生了意象。”^②知识生产离不开个体的心灵体验，这些体验往往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甚至难以用语言完全表达。可以说，是心灵体验赋予知识生产以深度和丰富性，使其超越了纯粹的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人类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持有特定的意图、目标和价值取向，利用这些资源来解释世界，解决问题，创造新思想。而互文性知识生产中的“意向性”并不是来源于模型自身的意识体验，它们只是被设计为模仿人类语言使用的统计规律和结构。模型本身并不具备创作诗歌的

① 张俊：《情感认识论：一个反现代性的知识学方案》，《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

② 何清：《意象：人类艺术心灵的直觉图像》，《求索》2010年第8期。

情感驱动力或审美判断力，它只是按照训练数据中发现的模式进行组合和变体。因此，模型的行为是高度优化的结果，旨在最大化预测准确性或用户满意度，而不是出于某种内在的目的或愿望。

在情感的基础上，想象力是人类一项关键的高级认知能力，它赋予了人类超越既定信息框架，编织新概念与情景的非凡力量。康德惊呼想象力是“创造性的，并且把知性诸观念（理性）的机能带进了运动”。^①凭借这一特质，人们得以构思那些前所未见的事物、构想未来的蓝图或是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诠释过去。正是想象力的存在，让人类突破了现有知识的藩篱，开启了无限的新可能之门，从而催生出创新性的理论、设计以及艺术作品。人类“结合着理性的纯粹观念及想象力的巨大力量”，^②可以模拟未知的情境，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甚至创造出全新的思想体系和范式。这种能力不仅停留在概念层面，还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社会的进步。从科学发现到文学创作，从建筑设计到技术革新，想象力无处不在，并在每一个领域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对互文性知识生产而言，尽管它们能够根据已有的文本数据生成看似新颖的内容组合或变化，这些所谓的“创新”大多源于统计概率的计算结果，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过程。这反映出机器在模仿人类创造力方面仍有其局限性，而人类的想象力则是一个更为复杂且难以复制的认知过程。换句话说，互文性知识生产的“想象力”受限于训练数据的范围和结构，并不具备自我意识去主动探索未知领域或挑战既定的知识边界。因此必须认识到，即便大语言模型的互文性知识生产能够在表面上复制这些特性，它们仍然缺乏作为人类经验核心的深度理解和个人意义构建能力。

（三）灵韵的退潮与主体语境耦合度的下降

“灵韵”（aura）源自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美学理论，用来描述艺术品在其原始环境中所特有的氛围或存在感，他对机械复制时代“灵韵消逝”持双重态度，既有对传统权威瓦解的哀悼，更有对大众参与新艺术形式的解放性期待。将“灵韵”应用于知识领域，指的是知识本身所承载的一种难以言说但又至关重要的品质，即灵韵能够在特定的情境中唤起共鸣，传递情感，并引发思考。借用本雅明的逻辑，即知识在其原初生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包括创作者的生命经验、历史情境、情感投入、思想挣扎、伦理抉择与个体风格。毕竟知识生产充满了情感、生命和富有个性化的意象，是一种诉诸感受的活的实践，是个体与文本、历史、文化、社会等多重语境互动的结果。个体的心灵体验和意向活动在与外部世界的对话中不断调整和重构，从而生成新的知识。王阳明曾言：“心之明觉处谓之知，知之存主处谓之心，原非有二物。存心便是致知，致知便是存心，亦非有二事。”^③比如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不仅通过文本获取信息，还通过与文本的互动激发自身的情感共鸣和反思，生成独特的理解和意义。可以说，知识的灵韵是一种独特而深刻的特质，它强调知识作为人类心灵体验的一部分，其生成过程充满情感、直觉、创造性和社会责任感。正是这些元素赋予了知识以生命力和灵魂，使其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的桥梁。这种知识的灵韵一般具有以下特质。

一是个人经历与情感投入。人类的知识生产深深植根于个体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世界。知识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体背景、文化语境和历史条件的影响。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文化环境和个人经历都为他们的认知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知识在人类社会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个体的感知与理解，在与具体情境、历史背景和文化脉络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一种鲜活的存有。这种鲜活

①②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1页，第74页。

③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下册），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88页。



的知识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更是对个体主观体验的回应。但互文性知识生产拼贴的文本，其素材虽经重新排列组合，也因缺乏与当下现实的即时互馈，无法像现场生成那样在语义、情感与文化脉络上实现同步更新。这种语境的间接性削弱了文本与特定时空的情感黏合力，让知识变得可读而非可感。

二是非逻辑性的突破与跨越边界的探索。人类的知识生产往往伴随着直觉和灵感的闪现，具有动态的、开放的属性。这些突如其来的想法或洞见，有时能够打破常规思维框架，揭示出全新的可能性。非逻辑性的突破亦为知识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使其超越了数据和信息的层面，成为富有创造力的表现形式。如前所述，通过创造性思维及想象力，人们能够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联系，提出新的理论或方法，从而丰富和发展整个知识体系。相比之下，互文性知识生产的内容更强调结构完整性与逻辑可预测性，从而抹平了可能引发情感张力的“不规则性”与“突发性”，让知识文本呈现出表面流畅、实则温度不足的特征。

三是共同构建的意义网络与负责任的知识创造。人类的知识生产不仅仅是个体行为，更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知识不仅仅是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更是人类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通过知识的应用，人类才能够不断改变自身的生活环境，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交流、合作和辩论来共同构建知识的意义网络。这种集体智慧的力量使得知识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价值，同时也促进了不同文化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融合。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进行知识生产时，不可避免地涉及伦理考量和社会责任。人类不仅要追求真理，还要考虑知识的应用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且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这种责任感为知识赋予了更深一层的价值，使其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工具，更是服务于人类福祉的重要资源。但互文性知识生产中的文化偏见、责任空白、价值歪曲仍然存在并愈发呈现马太效应，这对于人类整体知识结构来说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一言以蔽之，灵韵的退潮是互文性知识生产在技术化、规模化与制度化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主体和语境耦合度的系统性下降。创作者的情感投射与语境互动在生成逻辑中被弱化，文本与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之间的纽带被稀释。长此以往，知识生产虽然在信息层面显得愈加充盈，但在情感厚度与文化韵味上趋于空心化。这种空心化不仅会削弱文化的深度和审美感染力，也为“平庸之恶”的风险提供了累积的土壤，使知识生产更易滑向形式饱满却精神稀薄的状态。

互文性的风险机理：“平庸之恶”的生成及克服

“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源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描述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参与大屠杀时所表现出的机械性、无思性和责任分散的状态。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恶并非总是源于极端的邪恶意图，而可能源于一种平庸的、无反思的、机械化的行为模式。将这一概念引入大语言模型（LLM）互文性知识生产的反思中，具有深刻的理论契合性与现实警示意义。阿伦特所揭示的“恶”的新形态，源于现代官僚体系中思考能力的悬置，是个体在官僚系统中的顺从、例行公事与道德思考的缺席，这恰可映射当下算法驱动的知识生产机制中潜在的伦理盲区。并且，在大语言模型主导的互文性知识生产中，这种“平庸之恶”呈现出一种更加隐蔽且去责任化的技术形态，其生成机制源于互文性被技术系统全面接管后的结构性

后果。具体而言，这一机制至少包含三个相互强化的环节。

一是认知层面的“无思性”。互文性的自动化削弱了判断的必要性。用户习惯于接受模型提供的“一站式”答案，不再经历质疑、求证、反思的认知闭环。知识获取的便捷性，以牺牲深度思考为代价。马克思曾言，“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当文本生成不经过头脑，便不再依赖主体对“是否引用、如何引用、为何引用”的反思性判断，由模型自动完成时，判断活动被内嵌进算法流程之中，从而被自然化、不可见化。主体不再需要对知识的来源、立场与潜在后果承担认知责任。这种无反思性的知识生产不仅可能传播有害信息，还可能削弱用户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以满足即时需求为目标的知识生产，忽视了知识的文化价值和长期意义，就像赫胥黎警告的那样，“人们会渐渐爱上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压迫，崇拜变得被动和自私”。^②

二是生产层面的“同质化”。互文性的规模化制造了意义的均质化。模型基于主流数据训练，其输出天然倾向于共识性、安全性的内容，导致知识景观的单一化，抑制了挑战性、边缘性思想的生长空间。其结果就是知识的多样化被压缩，创新风险被系统性压制，异质思想被边缘化。用户只能接触到与自己观点相似的内容，失去接触多元视角的机会而形成认知盲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特殊的感受资料中，而这种感受资料自身是不可靠的”。^③若“对自己所采用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从不反思”，^④这种功利化的知识生产就可能抑制知识的自由探索。

三是伦理层面的“责任分散”。互文性的去主体化引发责任的弥散。从数据标注员、算法工程师到终端用户，知识生产的责任链条被无限拉长与稀释，导致无人对最终输出的偏见、谬误或平庸负责，形成一种系统性的道德冷漠。当知识生产被视为“系统生成的结果”时，任何具体主体都可以合理地宣称自己只是流程中的一环，从而使反思、质疑与道德责任在制度与技术结构中被持续稀释。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完成了一小部分工作，而整体结果是集体行为的产物，人们只是“循规蹈矩地说着陈词滥调，对所身处的现实麻木不仁，没有能力展开思考”。^⑤这种责任分散现象容易导致道德冷漠，使得潜在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进而放大系统的缺陷，甚至加剧对社会的伤害。

由此，互文性不再只是技术文本之间的关联方式，而成为一种将“不思考”制度化、技术化的认知机制。这正是大语言模型时代“平庸之恶”的深层逻辑所在。这种耦合的本质，在于将知识从一种充满情感、灵韵与责任的人类实践，转变为一种可计算、可复制、可消费的技术产品。这不仅是知识的去自主化，更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挑战。依此逻辑，防止智能化知识生产在无恶意的情况下，系统性侵蚀社会的创新与思考能力，是克服互文性知识生产带来“平庸之恶”的关键所在。未来的知识生产不应是人对机器的被动依赖，而应是“人机共生”的创造性协作。模型应作为激发灵感、拓展视野的认知伙伴，而非替代思考的答案机器。教育体系需强化批判性思维、跨学科整合与元认知能力的培养，使人成为知识生产的主导者与评判者，尤为重要是重构技术、主体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细言之，在技术层面，未来大模型的发展有必要从单一追求“生成效率”转向引入“认知张力”的设计导向。长期以来，模型性能主要以流畅度、准确率与用户满意度等指标衡量，这一取向在提升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促使复杂问题被持续压缩为低冲突、低不确定性的标准答案。所谓“认知张力”，不是刻意制造认知障碍，而是通过在生成机制与交互设计中保留不确定性、多解性与反思性提示，使技术系统不至于过早封闭问题空间，从而为判断、质疑与再思考保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②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③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骥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593页。

④ Cornelis van Hattem, *Superfluous People: A Reflection on Hannah Arendt and Evil*,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 p. 85.

⑤ 陈高华：《从多余性到无思性：论根本恶的平庸》，《学术交流》2017年第9期。

留必要的余地。只有当技术不再主动消解认知差异，知识生产才可能避免滑入表面高效、实则同质的平庸化路径。

在制度层面，如前所述，亟须警惕智能技术对社会整体创新能力形成“低阶锁定”。在“十五五”时期国家创新体系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智能技术将成为知识生产与科研评价的重要基础设施，其潜在风险在于其偏好可能对认知路径与知识结构形成长期路径依赖。如果制度设计过度顺应算法所偏好的高频议题与安全表达，基础理论研究、非主流探索与高不确定性创新将面临被系统性边缘化的风险。因此，有必要通过科研评价、资源配置与平台治理等制度安排，为长期探索与低可见度研究保留结构性空间，防止知识生态被算法效率逻辑所主导。

在主体层面，克服“平庸之恶”的最终防线仍然在于主体自身判断能力的重建。在此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心学”智慧，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王阳明“心即理”的思想强调，知识并非外在规则的简单累积，而源于主体内在的体悟、良知与实践中的自我反省，“心中之物在不同的心灵之间传递，便是塑造文明的力量”。^①在高度技术化的知识生产环境中，更需警惕判断被外包、责任被悬置的倾向。通过文化引导与制度支持，鼓励蕴含人文关怀、情感投入与独创精神的知识创作，有助于守护知识生产中不可完全被技术替代的价值维度。

可见，只有在技术设计、制度安排与主体能力三个层面形成协同推进，互文性知识生产才有可能从制造同质化与平庸化，转向激发真正具有差异性与创造性的思想。

结语

概而言之，大语言模型的兴起，使“互文性”这一原本用于揭示意义生产开放性的理论概念，首次被置于高度技术化、规模化与自动化的知识生产结构之中。本文正是从这一历史性转折出发，重新审视互文性在当代语境中的结构变形及其内在悖论。研究表明，当互文性从主体参与的话语实践，转化为由算法主导的统计关联机制时，其原本内含的差异性、否定性与生成张力，反而可能被压缩为最大概率意义上的“合理表达”，由此催生一种看似高效、实则同质的知识生产形态。在这一意义上，本文所讨论的“平庸之恶”，恰恰源于判断、责任与反思在技术互文性结构中的系统性悬置。当知识生产日益依赖自动化互文机制，主体不再承担意义选择的责任，创新便可能退化为既有话语的安全复写，复杂问题被简化为可快速生成的标准答案。这种平庸以高度流畅、逻辑自洽和广泛可接受的面貌出现，从而更具隐蔽性与结构性风险。但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知识平庸化趋势下人类将彻底丧失创新驱动的思考能力，甚至面临着灵韵、人性、情感、体验的彻底湮灭，个体的存在最终转变为无意识的、自动的亦步亦趋者。而大语言模型的抽象化、机械化、算法化、逻辑条理化的知识生产能力，将在无形中扼杀人自身的生动、丰富、细腻的知识感受与创造力。

阿伦特曾言：“无思想——不顾一切地莽撞或无助地困惑或一遍遍重复已变得琐屑和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正是我们时代的特征。”^②在这个技术愈发支配人类言说和行为的时代，应该不断重拾启蒙精神，勇敢地担当起思考与创新的责任，从而避免因知识平庸化生产而坠入去人类化的深渊。未来，需要避免互文性在技术加速中滑向去判断、去责任的平庸化形态，保有面对复杂世界作出判断、承担责任并开启新思想的能力。

编辑 李梅 校对 赵秋月

① 陈少明：《“心外无物”：从存在论到意义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②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4—5页。